

中亚文明史

第一卷

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 700 年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亚文明史

第一卷

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 700 年

主 编： A. H. 丹尼

V. M. 马松

翻 译： 芮传明

审 订： 余太山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文明史第1卷: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法)丹尼,
(法)马松主编;芮传明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ISBN 7-5001-0823-0

I. 中… II. ①丹…②马…③芮… III. 中亚-历史 IV. 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8562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1-0361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68002480

邮 编/100044

责任编辑/臧惠娟

责任校对/徐小美

封面设计/长 乐

排 版/北京金海中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印 刷/香河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28.625

版 次/2002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02年1月第一次

ISBN 7-5001-0823-0/K·61 定价:56.00 元

《中亚文明史》汉译本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顾问：季美林

总顾问：陈高华

顾问：（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耿昇	龚缨晏	华涛	蓝琪	厉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文锁	刘迎胜	马小鹤
牛汝极	潘志平	钱文忠	荣新江	芮传明
王颀	王邦维	王希隆	巫新华	徐文堪
于志勇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I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 UNESCO 1992

Chinese Edition ©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UNESCO ISBN 92-3-102719-0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NESCO PUBLISH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书所载事实的选择和采用及其所述观点均由作者负责,并不一定代表教科文组织的观点,而且与该组织无关。

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名称和所载资料并不意味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及其国界或疆域的划定发表任何观点。

序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费德里科·马约尔

教科文组织在其《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一，便是“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1968年出版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这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目前正在进行重大修改，而紧接其后则是一系列区域性出版项目，其中包括《非洲通史》以及尚处于计划阶段的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论述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史学著作。目前推出的《中亚文明史》也是这一扩大的出版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帝修筑长城的匈奴，公元六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廷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一直到十三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

仅仅用游牧民族的文化来认定中亚各族人民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中亚地区内部游牧与定居之间，畜牧者与务农者之间复杂的共生现象。而最主要的是忽略了中亚地区一些大城市的出现，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它们都建于中世纪晚期，后成为智力探索和艺术创造的杰出中心。哲学家兼科学家阿维森纳（布哈拉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帖木儿王朝那些永不过时的建筑艺术精品，集中体现了中亚地区草原和沙漠上中世纪文化的繁荣昌盛。

中亚文明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发展而成。伊斯兰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欧亚大陆周边的伟大文明也对这片土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内，这片贫瘠的内陆之海——远离地球上真正的海洋——一直是沟通中国、印度、伊朗和欧洲的商路（主要是丝绸）和思想之路的关键地区。伊朗的文明中心虽然地处东南亚，但它的影响特别强，以致于有时竟难以明确

界定伊朗本土文明与中亚边远地区的文明。

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也因此而受到多重的外来影响。千百年来,该地区不断涌入外来的艺术和思想,撞击着中亚固有的模式并逐渐与之融合。移民和经常发生的军事入侵的冲击,使一些民族和文化或融合,或取替,致使这片广大地区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世世代代人口流动的收缩和扩张更增加了界定这一地区的困难,因为仅靠其地表无法得出明确界限。因此当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决定出版《中亚文明史》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界定该地区的范围。后来在1978年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对中亚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本部历史所用“中亚”这一名称即指这一地区,与可明确辨别的文化和历史现实相符。

教科文组织号召专家,尤其是中亚地区当地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并得到广泛而慷慨的响应。学术界认为这一项目是拉开长期遮蔽中亚的帷幕的极好机会。然而,这项任务工程之浩大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1980年成立了一个特设国际科学委员会,对这项工作进行计划和筹备,并商定出版六卷本中亚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今天。该委员会最初的工作是决定眼前这幅宽阔的画布上哪一部分应最为突出。通过适当的过程,已作出公平的安排,并选出了主编和作者队伍。

目前,《中亚文明史》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研究和考古方面所用的各种资源都是最好的,以求工作精益求精,在该地区各大中心查阅的编年史数不胜数。我衷心祝愿本书第一卷和以后各卷对全世界的读者有所教益,并使他们从中得到满足。

我还要感谢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员和各位委员,以及主编、作者和各组专家,他们通力合作,详细叙述了中亚地区那极其重要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使人们对该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确信这部史学著作必将证明是对研究各国文化并使之互相欣赏的一项显著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目 录

出版计划说明

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S.阿西莫夫	9
编写《中亚文明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12
供稿者名单	13
导言 A. H. 丹尼 V. M. 马松	1
第一章 自然环境	
V. M. 马松	9
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V. A. 拉诺夫 D. 多尔基 吕遵谔	20
第三章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布里奇特·奥尔欣	34
第四章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A. P. 德里夫扬科 吕遵谔	55
第五章 呼罗珊与外阿姆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聚落以及其他聚落:东伊朗、苏联中亚及阿富汗	
V. 萨里亚尼迪	72
第六章 巴基斯坦与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	
M. 沙里夫 B. K. 撒帕尔	86
第七章 中亚东部的新石器时代聚落	
安志敏	107
第八章 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部落	
A. P. 德里夫扬科 D. 多尔基	118
第九章 伊朗与阿富汗的青铜时代	
M. 托西 S. 马利克·沙米尔扎迪 M. A. 乔因达	134
第十章 呼罗珊与外阿姆河地区的青铜时代	
V. M. 马松	160
第十一章 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前印度河文化及早期印度河文化	
J. G. 谢菲尔 B. K. 撒帕尔	177
第十二章 印度河文明	
A. H. 丹尼 B. K. 撒帕尔	207
第十三章 中亚东部的青铜时代	
安志敏	238

第十四章	青铜时代文明的衰落与部落迁移	
	V. M. 马松	250
第十五章	印度-伊朗人的出现:印度-伊朗语	
	J. 哈尔马塔	266
第十六章	阿姆河流域(巴克特里亚)青铜时代的畜牧部落	
	B. A. 列特文斯基 L. T. 皮延科娃	286
第十七章	后印度河文明时期巴基斯坦的畜牧-农业部落	
	A. H. 丹尼	299
第十八章	铁器时代的绘彩灰陶文化	
	B. B. 拉尔	320
第十九章	外阿姆河地区铁器时代的开端	
	A. 阿斯卡洛夫	337
第二十章	公元前一千纪初的畜牧与游牧部落	
	A. 阿斯卡洛夫 V. 伏尔科夫 N. 塞尔欧嘉夫	352
结论	编者	364
附录	释本书“中亚”一词的含义	
	L. I. 米罗什尼科夫	366
地图	369
参考书目	387
索引	426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戈先生大力协助,谨此表示深切谢意。

导 言

A. H. 丹尼

V. M. 马松

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扩大和加深人们对全世界人类史前时代的了解。对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研究,大大扩展了历史的时间界限,解释了在欧洲复杂的进化过程中某些主要成分的起源。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再度拓展了人们对于世界史前史的知识,令迄今未为人知的许多古文化和古文明中心得以公布于众。由此所导致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理论:将世界史视为普遍与特殊情况相结合的一种复杂模式。一方面,广泛的类似性反映了全球的趋势,或者正以巨大的地区性差异为背景对这种类似性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于特定地区和特定民族的研究正增添到世界文化的公共宝库中来。 19

有必要将对于特殊区域、大区的研究成果与其比较类型学特征综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点已得到广泛的认可。而这类研究方式的一个突出例子,便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非洲通史》。

本书专致于旧世界的另一个大区即中亚的研究。该地区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亚各族的作用与重要性在大学教程中往往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述,更不必说中学的教科书了。本书则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通常说来,本书探讨中亚各地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各章,均由在当地工作的学者撰写。编者考虑到不同学者的不同成就,因此用能以国际精神反映个人学术成果的一种方式处理材料。为了更完善地阐述该地诸族的历史,某些章节的作者使用了邻近地区的资料,这些地区尤其与西伯利亚、伊朗和东亚具有密切的文化接触。自从本书第一卷的初稿完成以来,中亚的许多考古新发现业已证实了书中的大部分推测,这些推测的基础是:中亚在世界文明史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中亚内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20

本卷谈及中亚文明史的上古时期,当时出现了最早的人类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当地文化和民族的发展。与此同时,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即作为一种普遍规律的文化演变的持续进步以及地区性差异,即使在这些最古的时代也变得相当明显。

古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充分地体现在中亚地区。在研究中亚古代史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各不相同的文化类型。首先,是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例如,在某个阶段,或者出现复合社会,或者出现等级社会。这一

发展千篇一律地伴随着各种要素,诸如手工业专门化、纪念性建筑,以及书写和交易体系等。该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旧世界和新世界显示出来。同时,这一总趋势在地方上的体现,取决于当地实际的生态和社会定位。在此程度上,我们谈及第二层次的现象,即地区性文化类型。这从中亚的材料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例如,在苏联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青铜时代的若干畜牧文化中,区域和分区的特征与某些共同的文化特色结合起来,使我们能将它们并入范围更广的文化统一体中。最后,我们可以区分出具体历史事例的基本单位,这个基本单位即是反映出一组部落或民族发展之普遍特色的地方性文化或文明。

本卷的作者遵循阶段化的观念,这反映在全书的结构中。开初的连续三章按照技术和文化的发展,逐一谈论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此时,各地之间的差别不大,或者无法以现在资料将其区分开来。有鉴于此,这些章节很少包括详细的地方性记述。随着食物生产的出现,地方性差别变得日益明显,它们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农业和畜牧业社会中。这些章节的描述和分析,则按照中亚大区中的历史和文化小区逐一进行。生存模式增添了变化: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与捕食者共存,他们居于中亚的北部和东部,从事狩猎、渔捕及食物采集。游动的农耕生活和稍后游牧生活的发展,使许多人群的机动性增加,迁徙与移居遂变得更为流行。好几种现代民族的祖先,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定居文明出现后的阶段,成为早期冶金时期的一部分。本卷之目的即在于论及全人类史前史中所有这些重要的里程碑。

有关旧石器时代的证据,尽管只限于一系列石制的工具,却依然相当丰富。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早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遗存,而通常说来,这类遗存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虽然如今人们认为东非的遗址最为重要,但是中亚仍保持着其较高的地位。即使不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也至少是早期人类居住的一个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使自己有效地适应于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可以推测,这就奠定了文化差异与地方特色(这种差异与特色可通过对石器类型的研究而辨别出来)的基础。一般认为,有关以手斧和砾石工具为代表的大文化区的假设,乃是莫维厄斯提出来的,^①主要依据巴基斯坦索恩(Soan)河畔的遗物组合。最近又出现了一种复杂得多的模式:旧石器时代遗物组合中的每一个地方品种都被区别开来,各种不同系列的砾石工具被视作判别的线索。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旧石器时代共同生活在中亚的各个群体,在制造石器时发展了各不相同的传统。在东地中海地区确立的此一现象,可能也发生在中亚地区。石器的类型清楚地显示出与西亚诸地的关联。南乌兹别克斯坦的特锡克塔什岩洞(Teshik-Tash Cave)墓地之发现,使一种尼安德特人群(Neanderthals)得以确定,这具有重大的意义。

^① 莫维厄斯(Movius),1944年。

人类如何开始建造定居的村社？这是个仍然有待于解答的大问题。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们曾对全新世时期的气候环境变化作出反应。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力发动一场文化方面的革命，以应付气候的变异，尚难以确切回答。然而许多学者业已接受 V. G. 蔡尔德(Childe)提出的模式，他谈及一种“新石器革命”，暗示人类为在新时期的生存而蓄意发展新的技术。该模式基于当时获得的下列证据：食物的生产起源于西亚，这项技术逐步传播至世界其他部分。如今，这类证据则更加多样化，中亚已经提供了明确的材料，展示出从事食物生产的聚落大致上在伊朗同步发展。可资证实者有锡亚尔克(Sialk)、希萨尔(Hissar)、桑伊查克马克(Sang-i Chakmak)等地的发掘结果，还有苏联中亚境内的许多岩洞遗址，如哲通(Jeitun)，以及诸多绿洲文化；巴基斯坦的梅尔伽赫(Mehrgarh)、^②乞力古尔穆罕默德(Kili Gul Muhammad)；克什米尔的布尔扎洪(Burzahom)；恒河流域的萨赖纳哈尔赖(Sarai-Nahar-Rai)、马哈达哈(Mahadaha)^③等地均是。与此同时，人与动物的关系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变化，这可由游牧人的术语表达出来。人类作为游牧群体中的一个成员，与若干种新的动物建立了全新的兄弟般的亲密关系，这些动物不仅供给人类食物，还成为其他用途的来源。这些动物便以这种方式附属于人类。这类关系如今可用动物驯养框架进行解释。这肯定是人类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进展之一，他们从依赖于大自然提供食物，进化到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状态，以满足为此目的而发展的技术的新需求。该需求因气候变化这一客观条件而产生。在全新世时期，新的动物和植物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环境。我们现在无法描绘出人类对此变化作出反应的整个过程，而只知道其结果，但是十分清楚的是，这种变化是逐步发生的，来自中亚的证据表明，该变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导致定居的农业，另一方面则导致中亚北部大草原以及沙漠和高山地区的游牧生活。^④

22

因此，显而易见，中亚乃是产生一种新型经济以及相关生活模式的更大地区的一部分。在对中亚进行多中心考古研究的过程中，揭示出那里存在着好几个地方中心。通常，我们可以将它们与较早期的或者中石器时代的遗物联系起来，所以一般而言，这种变化乃是自然的演变，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使用了现成的模式和标准。

上述历史变化的第一阶段被某些人称作“野蛮状态”，即生活的原始状态，因为它标志着聚落生活的初始阶段，然而，它肯定是人类利用其聪明才智改善生活条件的长征途中的伟大一步。早期农业聚落的农田水利导致了引人注目的粮食剩余，从而刺激了整个经济体制的发展。它导致了经验和物质资源的

② 贾里奇(Jarrige)和梅多(Meadow), 1980年。

③ 沙马(Sharma), 1983年。

④ 马松(Masson), 1983年。

交换；而最大的变化则是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个时期内显然已经出现了诸如玉之类的宝石、贝以及其他杂货的小规模贸易；较大规模、远距离的贸易则在下一阶段才出现，届时，金属的使用令采矿和冶金发展起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青铜技术的第一阶段，苏联中亚境内的各遗址间存在着陆路贸易，在此同时，与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的各处也存在着贸易联系。土库曼斯坦的阿尔丁特佩(Altyn-depe)、东伊朗的沙赫里索克塔(Shahr-i Sokhta)、南阿富汗的蒙迪加克(Mundigak)，以及巴基斯坦的梅尔伽赫等遗址，均可追溯到青铜时代聚落的开端，它们提供的资料展示了一个过渡阶段：从简单的食物生产逐步发展到具有五花八门专业技艺的复杂社会。作为社会集团存在的专业工匠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关系。很难说清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人们聚居到各个中心。有可能是受到手工业发展的刺激，也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或者纯粹是宗教或仪式的因素。在此同时，社会阶层可能因工匠集团之间特定的经济关系而产生，不论其动因是什么，证据则是形形色色的，犹如在巴基斯坦的拉赫曼德里(Rahman Dheri)、阿富汗的蒙迪加克(Mundigak)，以及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德佩(Namazga-depe)所见到的那样。在整个广袤的地区内，并未见到统一性，同时也没有这一时代的书写证据。

伴随着陆路贸易，在印度河文明区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也出现了越洋的商业与交流，此时，青铜时代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印度河文明的传播远远地超出了印度河流域，从古吉拉特(Gujarat)海岸，通过马克兰(Makran)地区，直至波斯湾沿岸各地，环环相扣。其成熟性不仅表现在高度发达的城市建筑，还表现在文字的使用(极可能由一个十分老练的缮写阶层使用)，以及日益增多的印章(可能用于贸易方面)上。当经过规划的城市出现时，突然迸发的印度河文明臻于鼎盛。尽管其他地区显示出各自的特色，但是，具有统一模式的印度河文明体系在古代世界文明中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广阔、丰富、影响以及广泛的联系，提供了中亚城市布局的全新构图。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亚青铜时代的发展乃是得益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扩散，然而，近期的证据十分清楚地表明，中亚青铜文明在本身的环境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其独有的特色证明它并非源于西亚。中亚各地的发展并不一致，从中国到阿姆河流域，从伊朗到印度河及恒河流域，其模式都不一样。至此，我们已经谈及“城市革命”、城市中心，及其广大的“不发达”邻居，对于后者来说，肯定依然按照传统模式生活着。

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地方城市、原城市文明以及农业的发展，都建立在地方经济潜力与文化传统的稳固基础之上。这是自然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在个别情况下，我们可以区分出受到激励的变迁，它采纳了最古老的文明中心——苏美尔、埃兰——首先确立的规范准则。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点，乃是原埃兰文化的巨大影响，从圆筒形印章到书板，用原埃兰字体书写，它们在伊兰高原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其中包括希萨尔与沙赫里索克

塔。我们可以看到,原埃兰文化是作为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之间文明的社会-文化复合体的一个主要部分而进入形成阶段的。

与此同时,在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早期生气勃勃地发展着的各地方文明的创造性,也十分出色。按照近期的研究,在埃兰发现的某些杰出的艺术品,系从东部伊朗及阿富汗的古文明区进口而来。如果说,印度河流域文明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在世界史的文献中确立了其地位,那么中亚南部各地的不少文明,则到如今方出现在考古学的出版物中。结果,我们便发现了一个居于中介位置的早期城市文明的小区,它的一侧为美索不达米亚,另一侧为哈拉帕(Harappa)。法国学者皮埃尔·阿米埃强调了该文明的固有特征,称之为“外埃兰”文明。^⑤ 日后或许能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术语,但是,在中亚南部另有一个文明中心,则无疑是得到证实的。

24

当文明在中亚南部发展时,其草原地区也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世界的历史与文化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好几个地方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而畜牧业在此期间则变得相当重要。从很古的时期开始,干燥的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就盛产饲料,拥有大量蹄类动物,因此,牧人们得以与其家畜生活在这一地区。极有可能在公元前四千纪开始马的驯养,与此同时骆驼的驯养则自南向北传播。至公元前二千纪,金属的广泛使用令畜牧业和农业完全成为食品的主要来源。草原地区的诸部落曾是新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渔夫。马拉的轻便车辆成为一项重大的新发明,以装有青铜头的长矛武装起来的战车武士,乃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工具也用青铜制成。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新型文化。机动和好战的牧人征服了干燥的大草原,并渗透进山区,更向南移,他们则侵入从事农业的绿洲地区。首先是阿姆河中游及巴基斯坦的考古遗址和墓地,展示了曾有大量的人类群体在文化的融合与共栖过程中进行迁移。

问题是,这些人群和部落到底是些什么人?最近的一些研究或许可以作出解答。来自古墓中的人类学材料提供了有关这批人群体貌外形的资料。^⑥ 有关旧石器时代的这些材料展示出,当时的中亚人类类似于欧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人。^⑦ 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于新石器时代之初,在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着基本上具有同一体貌的人群,犹如在欧洲和西亚那样。此外,在阿尔泰山区和明奴辛斯克低地,则是结合东、西方体形的混合型人群。在东方诸类型中,所谓的“蒙古人种”成分则开始在森林和针叶林带(泰加, taiga)地区发展。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证据则更为完善。中亚的北方各地包括在广阔的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区内。中亚

25

⑤ 阿米埃(Amiet),1986年。

⑥ 此处所用材料为V. P. 阿列克塞耶夫(Alekseev)教授提供。

⑦ 阿列克塞耶夫,1978年和1985年。

东部各地人群的骨骼较哈萨克斯坦的人群更为粗壮,但是这些差别恐怕是地方性的;总的说来,那里的人具有西方特征。

苏联中亚南部的人类学证据显示了体格粗壮程度的差异,而这是区分始自晚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西方诸类型——如安诺(Anau)型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体形较为细长的人生活在萨帕利特佩(Sapalli-tepe),类似于南部蒙迪加克的人;南塔吉克斯坦居民的细长程度则与卡拉德佩(Kara-depe)和吉奥克修尔(Geoksiur)的人相仿。因此,阿富汗及阿姆河沿岸的细长型变异,较土库曼斯坦和南塔吉克斯坦更为强烈。在公元前后交替之际的大迁徙中,西部群体又扩散到欧亚大草原的东部。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阿尔泰、图瓦和蒙古高原上的居民也属于这一人群,所有这些地区都是他们最初的居住之处。西部群体与东部群体在东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原地区进行接触交流。西部群体沿着西藏的北缘一直扩展到甘肃省,与当地的居民发生接触。

哈拉帕型遗址的居民相当一致,显然属于西方人种的细长类型组成了其主体。^⑧ 他们趋向于宽鼻型的面貌,类似于最初混有所谓尼格罗原型的北印度中石器时代的居民。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注意到,印度和巴基斯坦操前印欧语的居民属于西部群体。这些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扩散出去,而他们在人类学方面的具体情况,则唯有在发现了属于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其后各时期的材料之后,才能予以确认。因此,中亚最初居住的是由杂有西方人种和所谓欧罗巴型的原始型人,他们以稍有改变的形式生活在北印度,直到青铜时代。

在苏联中亚,建立在原始混合型基础上的西方型人可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石器时代演化成的。西藏最初居住着蒙古人种,他们沿西藏的边界,在甘肃和东蒙古高原与西方型人接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群的细长化以不同的强度演变。至青铜时代,苏联中亚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

各地方人群的种族关系很难确定;作为人种关系中重要成分的语言,肯定经历了数度变异。现在虽然有人对印度河谷文字进行了释读,但是未被普遍接受;按照广泛认可的一个观点,它属于前达罗毗荼型。方位统计分析似乎证实了这一迹象:达罗毗荼语在史前时期分布得更为广泛。^⑨ 在阿尔丁特佩发现的一颗镌有前印度河谷铭文的印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⑩ 出自伊朗的镌有前埃兰字体的书板,则表明其居民是以埃兰语为定位的。

不管最古老人群的语言归属是什么,中亚地区的居民曾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和一千纪初主要操印欧语系中的各种语言,当无疑问。在本卷第十五章中,哈马塔(Harmatta)教授解释了印度-伊朗诸部落的扩散。语言分析表明,大

^⑧ 杜塔(Dutta),1972年。

^⑨ 帕波拉(Parpola)等人,1969年。

^⑩ 马松,1981年。

量增加的词汇与牲畜饲养有关,尤其与原印度-伊朗统一阶段牛的饲养有关。这一点,以及与操原芬兰-乌戈尔语的居民接触这一无可辩驳的语言证据,似乎确认了欧亚草原地区曾是最古老的操印欧语诸部落的居地。因此,按照逻辑发展似乎可以推断,青铜时代大草原地带的语言,至少部分地属于印欧语种。有关各语言群所属之考古遗物与文化的详尽状况,则依然纯属推测。十分明显的是,青铜时代畜牧者迁移进苏联中亚和更南地区,以及相关的公元前二千纪错综复杂的文化演变,都与印度-伊朗部落和此后伊朗部落的扩散有关。

公元前二千纪,乃是地方城市综合体衰落和瓦解的时期。重要的城市中心,诸如苏联中亚南部的阿尔丁特佩、东北伊朗的特佩希萨尔(Tepe Hissar)、伊朗锡斯坦的沙赫里索克塔,全都衰败了。哈拉帕文明区的主要中心,包括莫亨朱达罗(Mohenjo Daro)以及哈拉帕本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有人试图把这些城市的衰落看作是同一进程,将哈拉帕诸城的衰败与雅利安人的入侵联系起来,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化。这一变化起源于不少因素,其中包括日益加剧的干旱气候,从而使农业大受损害,而农业却是许多古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公元前二千纪,高度发达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迁移浪潮,从科彼特达格山麓(Kopet Dag)到马尔吉亚那(Margiana)和巴克特里亚(Bactria),从印度河流域到古吉拉特和东旁遮普。自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开始,文化的演变越来越强烈,至公元前一千纪的头三个世纪里,则已产生了完全的文化改变。在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那出现了亚兹德佩(Yazdepe)型的早期铁器时代遗物,同时,在印度-巴基斯坦小区出现了绘彩灰陶。27 这些文化区域的内部逐步形成城市中心,于是产生了第二轮的文明发展。恒河流域的雅利安公国以及马尔吉亚那与巴克特里亚的小王国——达雅(Dahya)——均反映了国家和等级社会的出现。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一过程与早期青铜时代文明的发展有着某种类似性,若干基本成分有着继承性。就这点而言,巴格旺普拉(Bhagwanpura)型遗址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在广阔的草原地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早期游牧人取代了他们的直系先辈——青铜时代畜牧者。发生在中亚的这一事件,对于世界历史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结果,原先处于定居文明之外的草原地带变成了飞速发展的地区;与畜群一起迁移的草原部落群彻底改变了固有的政治格局。与游牧生活相关的新生活模式,反映这种生活活动力的新思想观念,以及这种生活的象征符号有翼马,全都呈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有轮车辆,尤其是乘骑马的出现,草原部落的机动性和信息传递速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扩展”了世界,使得新的规范和模式能够迅速地传至数千公里以外。以易让渡货物(即牲畜)为形式的财富积聚起来,由此引发了军事冲突,并刺激了武器的制造。成功的军事首领们采用了豪华的丧葬仪礼,试图永保其地位。早期游牧时代的演变,可与绿洲定居人确立文明之经济文化基础的“城市革命”相媲美。

以上所述,便是本卷所反映的中亚历史的总趋势。通过该地区无数民族的努力而创造的古代文化与文明,业已成为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如今仅仅开始研究他们的遗物,而相当大的部分仍有待于发掘。

英文版编者注

本卷付印时,发生了影响前苏联诸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因此,本书仍沿用了“苏联中亚”、“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说法。第二卷的文字则将反映出这一政治变革。